

目 录

海外赤子沧桑录.....	陈夏苏(1)
在马达加斯加的广东人.....	刘新舜(76)
战前马来亚华侨矿工.....	曾 定(92)
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的战斗历程.....	沈福水(100)
一九三七年马来亚雪兰莪树胶工人和煤炭 工人大罢工回忆录.....	周锦熙(184)
新加坡饼干工人的斗争.....	陈振春(155)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的战斗历程.....	马 林(162)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活 动琐记	孙增超 曾月华(205)
回忆新加坡华侨义勇军.....	罗须磨(214)
参加“马华抗敌后援会”活动忆述.....	祝 明(225)
《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三辑至第五十三辑 分类总目录	(288)

海外赤子沧桑录

陈夏苏

华侨世家

黄洁曾任广东副省长，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是黄家的长子长孙，他爷给他起个大名叫赐麒，取天赐麒儿之意，他自号山光，即台山光。他家算到他已是第三代华侨了。在他老家台山茶园他也称得上“华侨世家”。

俗语说：“穷家难舍，旧土难离”嘛，要不是为了混口饭活下去，谁愿意离乡别井、抛亲弃故去“过番”！黄洁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难以为生，迫不得已，卷起席子，携个破篮，含泪别了亲人，飘洋过海到了南洋。在新加坡做牛做马二三十年，饱尝辛酸，备受凌辱，积攒了一些钱，开了爿小金铺，靠自己的手艺，做金首饰活，赚得几个钱，克勤克俭，到了中年才返“唐山”讨了亲。

黄洁爹，继承父业，是个打金首饰的好手，人也精灵，金铺生意日见兴旺，赚了不少钱，家道中兴了。他爹打算在香港买屋，妈说：“树高万丈，叶落归根。咱家祖祖辈辈在茶园无寸土片瓦，在香港买屋，不如在家乡盖房子。”他爹听从妈的话，就在乡

里，盖了一栋楼房，上下二层，都是一厅三房，房子宽敞，设计入时，在村里是首屈一指的。屋子后面，种上竹子，长成了竹林，郁郁葱葱；屋前挖了一口鱼塘，放鱼种藕，夏日荷花盛开，亭亭玉立，颇有诗意。

黄洁7岁入私塾，但他秉性喜动，成天价捉鸟摸鱼。不是斗蟋蟀，就是放纸鸢；不是爬屋顶就是攀上树，教人不得安生。整整念了两年私塾，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他妈不知道骂了、哄了多少遍，就是拿他没办法。其实小洁早已下了决心，宁愿挨打也不愿到塾里念书。他一到塾里，心就发慌，那个戴瓜皮小帽，留着八字胡子，糟鼻子、瘦下巴的塾师，老是用指甲剔牙屎，还拿到鼻子下去嗅，看了叫人恶心。成天叫人不是背书就是写字，动不动就扬起那根重甸甸的戒尺，怎不令人心寒。他拿起书本，摇头摆脑，哼个不停，听了委实不耐烦，谁愿意呆在他身边呢。

1920年，黄洁刚满9岁。他爹从“家批”（信）里得知小洁的情况后，怕让他继续留在乡下，会变得越来越野，愈来愈蠢，就决定亲自返“唐山”，把小洁带到新加坡，在自己身边学点手艺，期望他有个长进。

这一年的秋天，黄洁他爹返“唐山”，合家团聚。秋去冬来，黄洁他爹决定带他去新加坡，亲友们都来送行，祝愿他们“顺风”。

临出门的那天，黄洁妈双眼含着泪水，给孩子穿上新衣裳，给他做好吃的，硬要山光把两个汤圆、两只荷包蛋都吃下去。她抚摸着小洁再三叮咛：“洁仔！你去南洋，要听爹的话，不要耍野，要好好上学去，认真走正道。”黄洁两腮挂着泪水，不说话只是点头。这时，他小小的心灵不知是迷惑还是高兴，妈哭了他也陪着哭，确实不懂得什么是离愁。可他临走时又扑向他娘身上，

叫了一声：“娘！我走啦！”

1920年初冬，他们父子俩到香港搭船去新加坡。黄洁同他爹整整坐了10天的海船，才到达新加坡。上了岸，小洁觉得火热火暴的，头脑有点晕眩，他爹赶快给他用冷水冲了凉。说来也怪，冲凉后小洁感到遍身清爽，精神为之一振。

新加坡，这狮子城，在黄洁的眼里样样都是新奇的：海水，清澈得像蓝色宝石一样；椰子树挺拔高耸，他爷爷说，椰子果是要猴子上树才能摘下来的，现在亲眼看到它确实高接云天，宽阔的大街，行人熙熙攘攘，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烧烤着的沙茶，散发着肉香，叫人垂涎；缠着红头巾、满脸胡子持着鸟枪在守门的外国人，曾听爷爷说过，他们叫“摩罗差”；还有那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芳香扑鼻的槟榔花，都叫人感到新鲜、有趣，富有诱人的魅力。新加坡华人多。黄洁住的地方，左邻右舍都是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四邑”人不多，黄洁很快就学会讲福建话和潮州话，这给他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刚过新年，黄洁爹就催促黄洁收拾书包上学去。他进的学校——养正学校——是广府帮办的。学校设备好，教师都是从广州聘请来的，多数是高师或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星洲算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但是，黄洁从一年级念到三年级，成绩都很差，又经常打架胡闹。老师对他印象不好，年终评语是：“既懒惰又鲁钝。”到了四年级，换了一个班主任。这老师对黄洁，耐心指点，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在老师热心教导下，黄洁终于变好了，“懂得自爱了。”“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学年，他得到操行优良奖。此后，黄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他和同学张子芳负责管理该校的小卖部，他了解各班级男女同学们的爱好和需求，想方设法组织货源，又能精打细算，薄利多销，把小卖部办得相当旺

盛，显示了黄洁经管企业的才能。学业进步也很快，一直到了毕业，都被评为好学生。他自己也经常说：“养正学校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小学毕业后，他患了肺病只好返“唐山”家乡养病，一连三四年，这段时间他感到苦闷和徬徨。

19岁那年，黄洁病愈了，他保养得好，看来满壮健。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器宇不凡，觉得在家赋闲不好，只得又重返新加坡，那时他父亲经营的金铺生意兴隆，俨然成了大户。按旧习俗说，他是大少爷啦，至少也该让他在铺里当个职员。可是，他父亲却要他在铺里当“后生”（学徒），打杂工还要学记帐、写信等等，月薪10元，他感到很委屈，满肚子气，抱怨父亲对他太刻薄，几次暗下决心要“飞”出去，又觉得自己的翅膀还不够硬，只得咬住牙根干下去。但他长大后，又不得不承认：“二年后生对我是很好的锻炼，是得益的，给我日后自行谋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年青时期的黄洁没有尝试过自由恋爱，当然也没想过要在这方面同“世俗”决裂。事实上，他很少有机会去同姑娘们交朋友，20岁那年，父亲要他回家乡结婚，他要求读多三几年书再说，可是他爹妈就是不答允，只好奉命回台山结婚。新娘的父亲也是华侨，家境殷实，她虽少读书，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但娴慧、文静又勤俭，会料理家务，会管家，是个“贤内助”。黄洁觉得有了她，可以“无后顾之忧”。就这样，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但夫妻相处30多年，感情甚笃。他俩一共有3个男孩，7个女孩，现在都成家立业了，有的还是新一代华侨呢！也算是黄家的第四代华侨了。

风雨如磐

黄洁结婚的那年，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祖国的贫穷、落后，使得“海外孤儿”也日益受人歧视、奴役和迫害。这冷酷的现实，形成一股令人透不过气的压力向他袭来，使年青时期的黄洁，开始认识到：“生活本身不是喝白开水，而是咸甜酸辣啥滋味都有呀！”这时他刚刚跻身社会，还不到“而立”之年，就深深地感到人生征途的崎岖、曲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方上下而求索”。生活就是拼搏，就是苦斗呵！

1934年，黄洁28岁了。他爹在新加坡的生意迭遭损失，终于一蹶不振。不久，他父亲逝世了，年轻的黄洁，在事业上顿失依靠，茫然若失。而且，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还有弱弟稚妹，这整副沉重的家庭担子，陡然压到了他的肩膀上，使他感到吃力、感到惶惑和痛苦。

由于他爹的死，一些“风水佬”就说他家门前那口池塘破了“风水”。黄洁妈信以为真，硬要黄洁雇工把它填平。塘是填了，但“风水”、家庭生计没有丝毫转机，生活的鞭迫使黄洁重返南洋。他到巨港去找他的叔父，叔父在巨港开金铺，卖金首饰。黄洁跟叔父学手艺，学做生意。一年后，他在叔父的帮助下自行开业了。

经过三四年的苦心经营，他的金首饰生意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黄金既可作装饰又可作为储蓄，金首饰就成为热门货，当地群众一有钱就购买金首饰，因此，巨港广东华侨多业金铺。铺子多了，竞争就厉害，“同行如敌国”，互相排斥，互相拆台，极为激烈。有的为了牟取暴利，不惜掺杂作假，根本不讲信用，严

重损害了华侨的信誉。黄洁对同业这种“缺德”的做法十分不满，忿慨地说：“这是摔破自己饭碗的蠢事！”为了挽回广东华侨在金首饰业方面的信誉，他倡议和推动，成立了巨港金业互助社，并出任社长。从此，他开始参加社会活动，逐渐成为巨港华侨社会的知名人士了。这在黄洁的创业史中，是值得回顾的黄金时期。

接着，“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了。祖国的大地在燃烧，人民在流血，作为炎黄子孙，海外赤子，在这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谁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黄洁慷慨激昂地动员金饰业的同业们，他说：“为了抗日，保家卫国，应该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他建议金饰业按年利四分之一捐献。当大家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耐心地诚恳地对同业们喻以大义：“如果国都亡了，那时海外孤儿的处境就更悲惨啦！肯定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盘剥和宰割，因此，在这关节眼上，大家要站得高，看得远哟！”

经过多次的讨论、协商，巨港金业互助社的社员都同意每户按年利四分之一捐献抗日。

金业界每月都为祖国抗日战争捐献，许多大户，也就经常关心祖国抗战的形势，谈论着祖国的政治局面。开始大家都是拥护蒋介石抗战的，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承认蒋介石是祖国的领袖。“爱憎及笠”，爱国当然也爱领袖嘛，这是常理，但是，等到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看看就有些不行了。蒋管区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都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危机。而国民党政权颓败、无能，乃至祸国殃民，尽失民心，根本没有能力动员人民有效地抗击日军的进攻。因之侨胞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了。很多人的心情是，恨国民党“铁”不成钢。由于对蒋逐渐丧失了信心，不少人也就担心抗日战争的前途，有些人已开始流

露出：“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的悲观情绪，特别叫人牵肠挂肚的是，惦念着“唐山”亲人的安危，也忧虑自己未来的命运。

接触了金业界的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思想，黄洁深沉地说：“看来国民党已经不行啦，现在，就看共产党的了。”但这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是不深的。

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担心骇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9月爆发了。侨胞们在战争的威胁下，遑遑不可终日。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同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同时进攻太平洋上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巨港危如累卵，战争的死神时刻威胁着善良的、无告的侨胞们。

1942年2月上旬以来，巨港市到处风声鹤唳，荷兰当局动员工商业界在撤退前要把工厂炸毁，但他们的官员却早已逃之夭夭。不战而降的征兆已见，人心浮动，治安极坏，情况十分混乱。爱国侨领们，密切联系，互相关心，征询什么时候撤出巨港，到什么地方去？总之，人们正在为逃避一场浩劫，而忙乱着。

黄洁为了处理结束巨港金业互助社的善后工作，劝说金业社的同乡们尽快撤离巨港，千万不能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合作。十多天来，忙得不可开交。2月8号，该做的事情都办完了，他决定立即离开巨港，免得夜长梦多。他把行期和到达的目的地告知了家人，就匆匆忙忙地动身去玛鲁亚了。

巨港是1942年2月15日沦陷的。沦陷前的一天，摩西河的东南面已经隐约地传来了沉闷的炮声。巨港最大的橡胶公司——福东公司——的买卖手薛两清，早就决定离开巨港，也主张把公司的橡胶厂炸毁，可是公司那个胖呼呼的总经理，此人比泥鳅还滑，对于“走，还是不走”，“工厂炸还是不炸掉”，他一直是态度暧昧

的。在这关键时刻，薛两清决定冲他一冲，克他一克，他要摊牌。

薛两清走进总经理室，朝着那个胖经理，态度十分严肃地问：“你，走不走？”

“不走远，不去山芭，日军来就避一避。”经理白了他一眼。

“公司的橡胶厂炸不炸掉？”薛两清毫不畏惧地追问。

经理头也不抬，慢条斯理地说：“炸掉太可惜哪，拧掉一些零件吧！”

薛两清火了，满脸通红，激动地说：“人走不走，厂炸不炸，这是区别抗日不抗日，爱国不爱国的分界线，要记住你是中国人！”语音一落，他阔步流星地冲出经理室，骑上单车，来到了摩西河畔，沿岸争着过河的人，背着沉重的包袱，扶老携幼，拥挤不堪，叫叫嚷嚷，哭哭啼啼，看了叫人伤心。宽阔的江面，激流千里，浩浩荡荡，百舸竞发，翻起一条条的白浪。小汽艇“突！突！突！”地尖叫着，显得那样烦躁，焦急和不安！

巨港总商会主席曾应时的家，就在摩西河的对岸，薛两清过了江来到商会主席曾应时的家，门外停着一辆福特牌的旧卧车，客厅里坐满了人，散放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运走。司机还没有来，车子开不动，大家既抱怨又着急。远处炮声隆隆，不能再等待了。商会主席曾应时要薛两清开车，可是，他学驾车才1个多月，还没有“出师”呢！现在可顾不了这么多了，车子能跑就行啦。薛两清真的大着胆子把车开动起来了。

这辆旧福特是名副其实的老牛破车，又超载，挤在车子里总共六、七人，还有很多行李，压得汽车“叽卡、叽卡”直喘气。途中只好把一大堆账簿丢掉。天黑了，又是山路，车走得更慢，气喘得更大，大家都提心吊胆。薛两清聚精会神，小心翼翼驶着

车，终于在深夜里到达了玛鲁亚，整整跑了270公里。大家如释重负，欢天喜地，都说这是“吉人天相啊！”

艰 苦 岁 月

自从日军占领巨港，黄洁虽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他坚持：宁愿妻离子散，乃至毁家纾难，也决不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合作；宁可浪迹天涯，也决不呆在巨港当顺民。经过了长途奔波跋涉，他来到了苏门答腊南部一个小村庄朱鹿镇，找到了一个姓朱的同乡，老朱是个“侨生”（华裔），讲着半生不熟、夹杂着很多印尼话的台山话。他对黄洁的来临，十分欢喜，像迎迓亲人一样地接待黄洁，他早就把黄洁要他代租的那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外打扫干净，还放上了一些家俱和简单的摆设。黄洁看了很是高兴，对老朱连声道谢。老朱设宴为黄洁洗尘，饭后再聊了一阵子，主人劝黄洁早些休息，就告辞了。

送走了老朱，黄洁感到很劳累，加上喝了几杯酒，似有睡意，可是一合眼，却觉得精神十分亢奋，辗转反侧，脑子里就像部放映机，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涌现出来了……

他临离开巨港时，曾再三叮嘱他的二弟，等把家里的地洞挖好后，就赶来朱鹿镇相会。现在已3月底了，仍不见二弟来。他急切希望二弟在身边，生活上的一些琐碎事就有个帮手，用不着自己操心。最令他牵肠挂肚的，还是躲在巨港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们。虽说家里挖了地洞，但毕竟是在虎口里，哪得安生呢！想到此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民”。

时间过的飞快，又是缓慢的。黄洁到朱鹿镇已快2个月了，他感到孤独和无聊，二弟还是杳无音讯，更使他忧心如焚。他请

老朱设法打探消息，但毫无结果，托人到巨港家中问个究竟，又说二弟离家已有十来天了。焦急、烦躁、疑虑和不祥之兆像大石头压在黄洁的心窝。他忧伤、烦闷，坐卧不安，怨艾自己不该让二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上路，他还是个未经风雨的年轻人呵！万一有了闪失，该如何向母亲交代。

俗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黄洁在为他二弟的安危感到忧伤的时候，又传来了日军在巨港搜查了他的家，他妈挨了打，好在伤势不重，妻子和女儿们躲在地洞里，总算有惊无险。

不久，王源兴、薛两清都到朱鹿镇来了。他们的到来，令黄洁喜出望外。他们3人，都是巨港侨团的头人，彼此熟悉，有交情，黄洁又有现成的房子，他们3个人就住在一起。在这动乱的时刻，“他乡逢故知”，使得黄洁的心情逐渐舒展开来。

在异国异乡的逃难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一面自己管理自己生活，轮流煮饭，自己动手种菜、养鸡；一面看书学习。他们同当地群众关系很好，和睦相处，多次得到当地群众的庇护。特别是，许多华侨对黄洁、薛两清恳切地说：“你们做爱国工作是替侨胞大伙做的，现在落难，谁不乐意帮忙呢。”侨胞们的真情实意，使黄洁感动得热泪盈眶，又感到很大的慰藉。

整整三年多，黄洁在朱鹿镇过着艰苦、惶恐、不安、危险的生活。但他仍保持着平易待人，热情而好客的作风。在这个山村里，他认识了不少进步的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接触了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同他们交朋友，谈时局，论政治。他们评击中国国民党，赞颂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抗战外行，内战内行”，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坚持民主进步的方针。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

下，黄洁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寄希望于共产党”的信念。他开始觉得中共坚持“抗日、团结、进步、民主”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听起来“顺耳”。在一些问题上，他同中共似乎也有“共同的语言”了。

一棵苦苗

薛两清，1914年出生，老家潮安萨垌。他父亲本姓陈，从记事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新衣裳，因为穷而入赘薛家，婚后还是穷。由于不堪地主老财的凌辱和压迫，他爸妈曾双双吃了鸦片羔企图自杀，幸被抢救不死，但穷苦的生活一直在磨折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从14岁那年起，薛两清就当过好几个店子，如药材店、干果店、米店的学徒，一连干了四年多，尝尽了旧社会里学徒们所曾经尝过的苦水，每天挑水、劈柴、煮饭、刷锅、洗碗、泡茶、提夜壶、洗马桶、倒痰盂、跑街驮货，从早到深夜，累得骨架子都要散了。夏天还要给东家扇风赶蚊子。冬天要煨补药；让少东家当马骑，稍有不如意，拳打脚踢，打得遍体鳞伤，这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对旧社会的仇恨；他多么想冲破樊笼，飞出去！

1931年，一个跑南洋当水客的亲戚，怜惜两清的处境，问两清他爸是否让两清去南洋，这位亲戚很有把握地说：“像两清这小子有力气、手脚又勤快，到南洋做工，每月少不了二三十块光洋。”白花花的银子在老人脑子里幌动，更何况当学徒尽做牛马活，实在是苦役呵！在亲友们的帮助下，薛两清在那年的春天去南洋巨港了。

三十年代的巨港，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人民辗转在失业、饥饿的死亡线上。黑社会势力猖獗，封建习气很浓厚，帮派纠纷严重，嫖赌吸毒盛行，同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薛两清到了巨港，举目无亲，异乡异客难以谋生，他失业了。只得寄住在橡胶打包工人和搬运工人的宿舍里，帮做些杂工，得些饭食填肚。整整五、六个年头，薛两清没能找到固定的职业，当过杂工、厨子、店员、也曾在“巴刹”附近摆地摊做小贩，但连血本都蚀光了。1936年春又失业了。同年夏天，朋友们给他船费返回家乡，返家后，家庭没能给他以温暖和幸福，而是给他增添了烦恼和痛苦，他感到哀怨，忿恨，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封建制度又再恶毒地咬了我一口！”他决然离家重返巨港。

年青的薛两清，没有给失业、贫穷、饥饿所压倒。他曾经写下了这段艰苦历程的一些片断：“看了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从这本书的内容，对照我过去和眼前的生活情况，我流了很多眼泪，因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如饥似渴地找进步书看。在殖民地看进步书是犯禁的。进步书是禁书，不容易找到；但我还是陆续找到了丁玲、茅盾、老舍、邹韬奋、郭沫若、鲁迅等作家的选集来看。这些书引导我积极地、热心地去探索、追求新的事物，使我初步学会了对周围事物和过去在我生活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疾苦加以剖析。我回忆起在橡胶打包工人那边看到的情景：老板为着要偷出口税和运费，规定每包橡胶的重量一定要超过250斤。而这样笨重的东西，本来应该两个人来干，但老板只许一个工人扛，由于长期的过度负重干活，工人因伤致残的很多。每人每天还要做12个小时以上的工，老板还要花招愚弄、欺骗工人，借钱给工人吸鸦片，利用鸦片来激励工人的工作效率，真是毒如蛇蝎，简直是‘谋财害命’啊！当橡胶跌价，橡胶滞销，停止出口

了，工人也失业了，钱也花光了，还欠了老板的债，更惨绝的是，鸦片烟瘾也染上了。这是华侨工人的血泪史啊！”

到了1937年初，国际橡胶价格略有回升，薛两清找到职业了，他在一间橡胶出口商当磅货手兼记帐员。干了将近一年，转到一家橡胶公司当采购员和写信员。1941年进入巨港最大的一家橡胶公司当买卖手。有了职业，生活安定，给他的自学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这段时间他又读了很多书，增长了很多知识，有了较好的思想方法。他从茅盾的《子夜》里，“知道了资本家能指挥军阀的军队，要他进就进，要他退就退”。学习了鲁迅的杂文，“提高了我分析事物的能力，比较能分辨是非、善恶。学习运用鲁迅那讽刺的武器，向我周围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掷出投枪”。随着学习的逐渐进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逐渐明确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他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向国民党分子的诬蔑进行了斗争。

现在，他同黄洁、王源兴一道过着流亡生活，他仍然保持着学而不倦的旺盛情绪，想方设法找到了很多进步的书，如高尔基、果戈里、鲁迅等大文豪的作品，还有艾思奇、邓初民等人的理论文章，孜孜不倦的阅读，由于他当时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情况，他接受进步的理论很快，他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是工人队伍的一员。他很欣赏这样的道理，人只是一滴水，一滴水要不干，只有流进江河，注入大海。

吐气扬眉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结束了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中国和世界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9月1日，黄洁重返巨港，他兴高采烈，觉得抗日胜利了，祖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一，国际地位提高了，摘掉了“弱国贱民”的帽子了。自己也结束了流离颠沛、朝不虑夕的苦难生活。

回到家里，老母健在，妻儿平安，今日团聚，欢天喜地，都洒下了高兴的热泪。虽说已得到证实，他二弟是在去朱鹿镇的路上被坏人谋财害命死的。但事情已过去了，伤心了一阵子，也就没啥了。返巨港后，黄洁的心情是欣乐的，但对今后的事业也不无惆怅。他过去的事业基础，原就不够坚实，巨港沦陷后，更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此时萦回在他脑际的是如何重新创业。

黄洁认为，过去搞了10余年的金业，水浸牛皮，进展不大。再搞金业，觉得厌倦。重操旧业，固然可以驾轻就熟，但毕竟“饿不死，胀不肥”地混日子而已；立志改行，重起炉灶，创业艰难，但有奔头。经过反复思量，他的结论是：巨港出产以橡胶、石油、渔产为大宗。“市情之兴衰系于胶价”。应该着眼橡胶，着手搞进出口。本来，在1941年他就曾打算转业搞进出口，当时囿于条件，遂与友人组织“南洋橡胶公司”，他自己依然经营金业。现在他下了决心重新创业，搞橡胶加工兼营进出口。

几经磋商，多番筹划，黄洁和许崇德、颜西岳、陈剑敦还有一个侨生（华裔）张振华共五个人为核心，组建了“巨港信记有限公司”。他们原想请薛两清也参加，可是薛返回巨港后，又被福东橡胶公司聘请为采购员。薛还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一个用钢板刻的刊物，读者对象是青年店员、工人和学生，内容是报导祖国抗日胜利后形势，比较隐蔽地介绍了国内的进步力量的发展情况，只出版一期，就给巨港当局警察厅禁止了。黄洁和薛两清虽不在同一公司，但他们支援祖国民主进步事业的工作却是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的。

许崇德出身贫寒，是薛的同乡，早年丧父，靠“过番”的哥哥提携，才能进学校念书，在校里是全班的佼佼者，聪明而又勤学，很得老师的爱护，着意培养，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1928年，他12岁时，就参加了儿童团，1924年，去潮安府城参加列宁逝世追悼会。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1927年，他哥把他带到新加坡，在一个同乡开的店子里当学徒，他哥又返回巨港。到了1937年他才来巨港，就在一家肥皂厂当职工。每天不管多苦多累，他还是读书到深夜，鲁迅的著作对他启发、教育最大。他为人热情，颇有谋略，人家给他个绰号，叫“潮州孔明”，他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学问。因此，很受黄洁的器重，与薛两清也是莫逆之交。

信记公司集中了比较宏厚的资金，罗致了许多人材，按照黄洁、许崇德自己说的：咱们搞五湖四海，不搞一帮一派。这在当时华侨社会来说，不存在地域、帮派观念，也确实为难能可贵了。对大胆起用“侨生”（华裔），更有独到之处。信记公司董事长一职就是由一位对巫人有深厚感情；又与巫人有比较广泛联系的“侨生”张振华来担任，因之，信记公司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始终是比较密切的。黄洁任总经理，许崇德任经理，对公司的其他职员，也颇能唯才是举。他们还仿效新加坡一些留美归来的大亨们的做法：让每个职工都是公司的股东，给股东分红占到总利润的30%，至于职工的宿舍、医疗和养老金问题，打算待企业发展后再办。黄洁说：“最能使职工发挥工作积极性，就是用分红把职工和企业连在一起。”这套办法，赢得了职工们的支持。信记还设立分公司，新加坡的子公司同巨港的母公司是一同起步的，1949年又设立了椰城分公司。

信记全力经营进出口，租船运出橡胶等土特产，通过新加坡

子公司掌握价格适时抛出后，购进轻工业品运进巨港。这样一出一进，笃定是有利可图的，可惜一开始出师不利，沉了船受了损失，业务也就曾陷于半停顿状态。因此，引起了内部较大的争议。经理许崇德说：“公司的营业方针必须尽早确定。以商养工不能搞得太久，橡胶不加工，出口价低，就难以赚大钱，当务之急，必须集中资力建橡胶加工厂，出口干胶方是上策！”许崇德的这个意见，黄洁是赞赏的，完全同意的。但是五个核心成员中，却有三人不同意，他们都是公司驻新加坡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坚持着另一种意见：“如果一定要集中资金马上建立橡胶加工厂，那么巨港和新加坡最好分开核算，黄牛下水各管各，各自分发股东的花红。”他们的这个意见被黄洁、许崇德接受了。之后，黄洁在巨港放手大抓橡胶，马上筹建橡胶厂，橡胶加工厂当年基建，当年投产，又逢干胶好价，巨港方面盈利颇巨。年关到了，如何进行分红呢？如果按照巨港和新加坡两地核心成员协议，即各自分红，则新加坡那边的股东，势必所得甚微，而巨港方面的股东则所得至厚。当然，执行协议是“天公地道”，无可非议的。但友情和信记公司的前途，则很可能受到影响。他们两人极其慎重地考虑着这个问题。

许崇德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在钱的问题上，该争则争，应让则让。今年公司分红，虽有协议，但我们应该高姿态，推倒重来，主动提出母子公司统一核算，统一分红。把钱让出来，使大家皆大欢喜。‘和为贵’，何愁公司不赚大钱。”黄洁接纳了许崇德的意见，并写信告诉了新加坡子公司三个负责人，他们得悉后，对黄洁、许崇德十分钦佩，此后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信记“起飞”了。黄洁也成为巨港侨团举足轻重的人物了。